

一個消失的「新名詞」：「伯理璽天德」

潘 光 哲^{*}

摘 要

「伯理璽天德」作為與“president”的對等辭彙，是十九世紀的漢語世界裡出現的一個「新名詞」，主要意指民主共和體制的國家元首。檢討「伯理璽天德」的歷史，它作為「新名詞」，在過往的歷史場景裡，曾經取得眾所公認的「共識」意涵，成為「常識」，並且儼如「關鍵詞」一般，產生影響。藉著「伯理璽天德」的個案考察，這等由「新名詞」到「關鍵詞」的歷程／現象，實為值得我們重視的面向。

關鍵詞：伯理璽天德、總統、新名詞、關鍵詞

^{*}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A Forgotten New Term: “Bolixitiende” in Late Qing China

Pan Kwang-che

Abstract

When “president”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ost popular word was “Bolixitiende” (「伯理璽天德」). This essay focuses on how “Bolixitiende” as a “new term” was created, circulated and finally disappeared. Telling the story of “Bolixitiend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we can find the process of how a “new term” played the role of “keyword.”

Keywords: Bolixitiende, president, new terms, keywords

一個消失的「新名詞」：「伯理璽天德」

潘 光 哲

一、

1911年12月31日，安徽績溪出身當時人正在上海的胡覺（嗣桓，1877-1929）寫信給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念書的弟弟胡適（1891-1962），告訴他10月10日武昌事起之後故國山河的情況，「祖國一切情形，迄未恢復」。不過，孫中山（1866-1925）已經返國，當選「臨時大總統」，儼然「一躍萬丈，洵不愧當今之人傑」，欽譽之情，躍然紙上。¹翌日下午6時15分，獲選斯職的孫中山，進入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隨後即舉行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禮炮廿一響餘音繚繞之際，孫中山宣讀《臨時大總統誓詞》，宣布了民主共和體制的中華民國正式成立。英語“president”的漢譯，在十九世紀的場域裡，多樣難盡；²當中華民國初始創建的時候，「總統」這個辭彙，

* 本文陸續承蒙沈松橋、金觀濤、劉青峰、桑兵、王汎森、陳力衛諸教授之修正，謹此特致謝悃；一切文責自由作者承負；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美國憲政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計畫編號：NSC-97-2410-H-001-097-MY2）之部分成果。

¹ 胡覺：〈胡覺致胡適函〉（1911年12月31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JDSHSC-0692-009〕）。按：本函自署繫年為「十一月十二日」，當即1911年12月31日；惟內文曰：「昨日南京各省代表投票選舉大總統……」，此為1911年12月30日事；揣想胡覺始草此函於1911年12月30日，完稿於翌日。

² 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華英字典》（1823）譯為「長、頭目」；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漢辭典》（1847）譯為「監

等於“president”的對應詞，是民主共和體制的國家元首的稱謂，已是眾所公認，³並且好似永矢不易，沿用至今，更是我們言說民主共和政治體制不可或缺的「關鍵詞」(keywords)，⁴其來龍去脈，實在饒有意味。

回顧歷史場景，「總統」這個辭彙在漢語世界之定著，本非朝夕之功。蓋在「總統」一詞為中國公眾同知共曉之前，用以指稱民主共和體制的國家元首的辭彙，固是諸多繁雜，「伯理璽天德」一詞，

督」、「頭目」、「尙書」、「正堂」、「天卿」、「地卿」等；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的《英華字典》(1866)除沿用麥都思的翻譯之外，並將“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譯為「花旗合部大憲」；商務印書館的《華英音韻字典集成》(1902)，除了譯為「掌者」、「總管」、「頭目」、「監督」、「正堂」等等之外，卻將“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譯為「美國總統」。參見熊月之：《晚清幾個政治辭彙的翻譯與使用》，《史林》第1期(1999年2月)，頁57-63。

³ 在1912年之際，如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與人合作撰書介紹孫中山，即稱他已獲選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to be proclaimed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參見James Cantlie, C. Sheridan Jones, *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12), 10.

⁴ 關於「關鍵詞」研究，自然必須言及英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業績：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3 [revised edition])；漢譯參見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在威廉士看來，「關鍵詞」一方面，在某些情景及詮釋裡，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領域，它們是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抑且，威廉士強調，即使應用「歷史語義學」(historical semantics)的方法，研究「關鍵詞」的時候，「不僅強調詞義的歷史源頭及演變，而且強調歷史的『現在』風貌——現在的意義、暗示與關係」。但是，他更有意挑選與諸般「變異、斷裂與衝突之現象」相關者，以展示「詞義的延續、斷裂及價值、信仰方面的激烈衝突等過程」。參見威廉士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導言」，頁XXVI、頁XXXIV-XXXV。當然，威廉士的「關鍵詞」研究，他本人對相關理論之申論甚眾，並自有其形成史(含括其個人政治社會關懷等多重意義)，即便廣受矚目接受，同時批判亦眾，略可參見Alan Durant, “Raymond Williams’s Keywords: Investigating Meanings ‘Offered, Felt for, Tested, Confirmed, Asserted, Qualified, Changed,’” *Critical Quarterly* 48, no. 4 (Winter 2006): 1-26；相關細節，本文不可詳論。

流傳最廣。⁵就整體歷史脈絡而言，「伯理璽天德」其實是在十九世紀的漢語世界裡才出現的一個「新名詞」，應可視為「現代性」的制度面向導入中國的具體徵象，⁶它的誕生、問世與定著，本即錯綜複雜；歷經傳衍承繼，「總統」一詞沿用至今，而「伯理璽天德」一詞則若被遺忘不存。只是，「總統」作為漢語世界裡不可或缺的「關鍵詞」，在我們當下生活裡被廣泛運用；當年也具有同等「關鍵詞」作用的「伯理璽天德」，則卻完全被淘汰，若被遺忘不存，成為「新名詞之戰」的「輸家」。⁷以「伯理璽天德」這個「新名詞」竟若青史成灰為例，足可揭示，當前那些用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的語言辭彙，如何被打造形塑而成的歷史，非僅是近代漢語發展變遷的一個切片，更是近代中國觀念變遷的歷史圖景裡不可或缺的一頁。

二、

「總統」一詞早即見於十九世紀以前的漢語世界，然非吾人今日習指之內容。筆者以「總統」為詞，使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檢得經史資料，皆為動詞意義；⁸至如「伯

⁵ 與本篇述說頗稱相關而思路略為不同的研究成果，參見熊月之：〈晚清中國對美國總統制的解讀〉，《史林》第1期（2007年2月），頁1-11；餘例不詳舉。

⁶ 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第4期（2005年7月），頁130；其他關於「新名詞」的探索成果甚眾，不詳引注。

⁷ 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頁1-42。

⁸ 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檢索所得，如《重槩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見《重槩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重槩宋本穀梁注疏附校勘記》：「喻諸侯天子總統萬物」；又如《後漢書·孝獻帝本紀》卷九：「置都護，令總統西方」，檢索日期：2011年12月9日。周商夫（起予）編輯的《新名詞訓纂》（1918），追索「新名詞」在古代典籍裡的淵源，注明「總統」出處為《漢書·百官表》：「參天子而議政無不總統」，參見周商夫編：《新名詞訓纂》，頁3A；本文引用的版

理璽天德」一詞，則僅見於《清史稿》。⁹「伯理璽天德」實為最初對“president”的對應翻譯，並用以稱呼美國總統，其首創於誰，尚難確切得悉，難可確證核實；¹⁰抑且，在晚清時期「伯理璽天德」得以作為“president”的對應譯詞，即便甚為「流行」，更非水到渠成，其創生至形成「共識」之過程，實是錯綜複雜。

早在1844年時，官方文書已使用「伯理璽天德」一詞，如：〈兩廣總督耆英奏為照錄美使所譯漢字國書呈覽摺〔道光廿四年八月十四日（1844年9月25日）奏呈〕〉附〈咪喇堅漢字國書〉云：

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玉罕泰祿恭函，專達於大清大皇帝陛下……。¹¹

出現在1858年的另一份官方文書：〈中美和好條約〉（1858年9月24日在天津互換），也使用相同的辭彙：

大合眾國大伯理璽天德特派欽差駐紮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¹²

可以想見，「伯理璽天德」一詞早於1840年代已然問世，且為官方採用。

本是周商夫編：《新名詞訓纂》，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文資料彙刊》（東京：不二出版，1995年〔據1918年上海掃葉山房刊石印本影印〕），第5篇，第3卷，頁299。

⁹ 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檢索所得，見趙爾巽等編：《清史稿》，卷156，〈志·邦交〉：「秋七月，美伯理璽天德林肯亞伯刺罕遣使蒲玲堪安臣致皇帝書」，檢索時間：2011年12月9日。

¹⁰ 西川秀和認為，可能是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的翻譯，參見西川秀和：〈「大統領」という訳語の由来〉，「歴代アメリカ合衆国大統領研究」，網址：<http://www.american-presidents.info/daitouryoutoiuna.pdf>，檢索日期：2011年4月19日。

¹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冊，頁499-500；參見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清內府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1930年〔景印〕），卷72，頁47B。

¹²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1，頁175。

只是，約略同一時段之際的論說，未必皆以官方採行的辭彙是從。例如，魏源（1794-1857）纂輯的《海國圖志》（1842年首度出版，1852年增補為一百卷出版）¹³與徐繼畲（1795-1873）編撰的《瀛寰志略》（1848年初刻）等等，¹⁴率皆為足可讓人們得以了解世界局勢的一時名著。彼等之著，或以「統領」稱之，¹⁵或以「總統領」稱之，¹⁶即為著例。下逮1850年代，以英國倫敦傳道會的牧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¹⁷為主要翻譯者的《大英國志》（1856年首度出版），¹⁸則如是述說：

天下萬國，政分三等：……有無帝無王，以百姓推立之一人主之，限以年數，新舊相代，西語曰伯勒格西敦（譯即為首者之稱），如今之合眾部是也。¹⁹

¹³ 王家儉：《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頁132-134。

¹⁴ 徐繼畲《瀛寰志略》的撰述史，參考陳存恭：〈徐繼畲事略及其《瀛寰志略》〉，收於任復興主編：《徐繼畲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8-9。

¹⁵ 魏源：《海國圖志》，50卷，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仲夏古微堂聚珍板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38，〈彌利堅總記上〉，頁20B（其他版本，不詳比對）。

¹⁶ 徐繼畲：《瀛寰志略》，收於白清才、劉貫文主編：《徐繼畲集》（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第1冊，第9卷，頁267。

¹⁷ 慕維廉於1847年抵中國，生平事蹟等，參見魏外揚：《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頁372-376；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25-148。

¹⁸ 慕維廉譯：《大英國志》，耶穌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院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此版本卷末附有〈《大英國志》續刻〉，已說及英法聯軍攻陷北京，1860年10月「二十四日，和約立；十一月初五日，英、法兵退自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英京城宣講和約事」；查〈中英北京條約〉確實於1860年10月24日「蓋印畫押」。見陳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上冊，頁394。是則，此一版本當出版於1860年12月27日以後。

¹⁹ 慕維廉譯：《大英國志》，〈凡例〉，頁1A-1B。

協助《大英國志》譯事的蔣敦復（1808-1867），²⁰ 在1850年代末期，則以「大伯勒格斯」稱呼美國總統。蔣敦復說，美國建國之後：

……分建列邦，邦之百姓推擇一人統其眾，為伯勒格斯（君民共政之稱），眾伯勒格斯中推擇一人為大伯勒格斯，軍國大事咸取決焉。²¹

蔣敦復個人使用「伯勒格斯」一詞來稱謂美國的總統，則始終不變。如其於1860年撰〈英志自序〉，²² 文曰：

地球九萬餘里，邦土交錯，立國之道，大要有三：……一、民為政，西語曰伯勒格斯，今之美利堅（俗名花旗，在亞墨利加州〔洲〕）及耶馬尼、瑞士等國是也……。

1866至1867年間，蔣敦復又撰〈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則曰：²³

泰西各國，政有三等：一、民為主，西語曰伯勒格斯，今南、北美利加等國是也。

蔣敦復的兩篇作品都明確說明，在「民為政」或「民為主」的政治體制裡，其國主之稱謂曰「伯勒格斯」。可以想見，1860年後，蔣敦復已固定使用「伯勒格斯」一詞稱謂美國的「總統」。

相較於這些與「伯理璽天德」大相逕庭的辭彙，來自美國，曾任同文館總教習的傳教士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²⁰ 王韜在1853年薦蔣敦復與慕維廉，進行譯事，稿成於1856年，參見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臺北：廣文書局，出版年缺），頁19、21。

²¹ 蔣敦復：〈海外兩異人傳：華盛頓〉，收於《嘯古堂文集》，同治七年（1868）上海道署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5，頁5A-7B。

²² 蔣敦復：〈英志自序〉，收於《嘯古堂文集》，卷7，頁2B-6A；寫作時間繫年為「咸豐十年（1860）」。

²³ 蔣敦復：〈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收於《嘯古堂文集》，卷3，頁15A-22B。

1827-1916) 翻譯的《萬國公法》(1864年出版),²⁴ 則有明確的表述。《萬國公法》這部書堪稱為「國際法」知識引進東亞世界的「共同知識文本」, 影響深遠,²⁵ 丁韞良明確指出美國的「首領」即是「伯理璽天德」:

首領乃美國之語, 所稱伯理璽天德者, 是也。²⁶

日後擔任過清廷駐英欽差大臣的張德彝(1847-1918), 出身於同文館, 可謂是丁韞良的門生, 1866年, 年僅十九歲的他, 開始就出洋遠遊, 得以見識異國風情的多番樣貌,²⁷ 當他訪問俄國時, 也有這樣的議論:

……美國……每四年眾舉一人為統領, 稱伯理璽天德……。²⁸

但是, 1860年代末期之際, 「伯理璽天德」一詞似乎尚未成為「共識」。例如, 1868年, 志剛(生卒年不詳)稱美國總統為「伯理喜頓」,²⁹ 讀過《美國志》與《瀛寰志略》的志剛,³⁰ 使用「伯理喜頓」如此稱謂, 本乎於何, 莫得其詳。此時與之同行的張德彝, 則又使用「統

²⁴ 丁韞良譯:《萬國公法》, 同治三年(1864)歲在甲子孟冬月鐫, 京都崇實館存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²⁵ 關於《萬國公法》在晚清中國的影響, 研究甚眾, 最稱精要者厥為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餘例不詳舉。

²⁶ 丁韞良譯:《萬國公法》, 卷1, 頁35A。

²⁷ 關於張德彝的出身及其歷次出國情況和著述, 參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 1985年), 頁87-107、177-192;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北:作印本, 1985年), 頁174-178。

²⁸ 張德彝:《航海述奇·同治五年六月八日(1866年7月19日)日記》, 收於《稿本航海述奇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年), 第1冊, 頁301-302。

²⁹ 志剛:《初使泰西記》, 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 1985年), 頁270。

³⁰ 志剛於1868年6月11日參觀美國的華盛頓墓, 說華盛頓「其人其事, 《美國志》與《瀛寰志略》載之頗詳」, 見志剛:《初使泰西記》, 頁271。

領」一詞：

合眾國……民主其國，公立統領一人為首……副統領佐之……。³¹

由是可見，即便是同一個人，對辭彙的選用，前後亦未必固定一致。

下逮 1870 年代，「伯理璽天德」即是美國總統的稱謂，基本上已是共識。當 1876 年美國立國百年之慶，於費城舉辦博覽會，服務於寧波海關的江寧人李圭（生卒年不詳），³² 受命與會，他將自己訪問美國的聞見，「事無鉅細」都筆之於書，撰成《環游地球新錄》，³³ 回國後送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得到「給資印行至三千部」的獎勵。³⁴ 李圭雖然誤以為美國總統由各省「督撫中公舉一人」擔任，稱謂美國總統的辭彙則為「伯理璽天德」；³⁵ 因此，有緣參觀美國總統住所「白宮」的李圭，即稱之為「伯理璽天德宮」。³⁶

³¹ 張德彝：《再述奇·同治七年閏四月廿七日（1868 年 6 月 17 日）日記》，收於《稿本航海述奇匯編》，第 1 冊，頁 528-530。

³² 相關研究如鈴木智夫：〈李圭の訪米と在米華人〉，收於氏著：《近代中国と西洋国際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7 年），頁 159-183；按：李圭此行於 1876 年 5 月 14 日自上海啟程，翌年 1 月 17 日返抵上海。

³³ 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頁 167-362；以下引用，逕注書名與頁數。

³⁴ 李詳：〈運同銜升用同知浙江海甯州知州李君事狀〉，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卷 45，頁 18A-20A，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第 117 冊，頁 577-581；據鈴木智夫考查，《環游地球新錄》在 1878 年 7 月 17 日由海關造冊處印刷 300 部，其中 100 部由海關代行總稅務司裴式楷（Robert E. Bredon, 1846-1918），送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100 部，其餘 200 部則交由「施醫院」與書坊發售。參見鈴木智夫：〈李圭の訪米と在米華人〉，頁 177-178。

³⁵ 李圭是從陪同他的「美官格言」那裡得到這項訊息的，原文是：「美國一省即一國，乃合眾國而為國，各有事權。督撫以下各官，皆由民間選舉，四年一任，原可毋庸另舉一伯理璽天德。惟遇與他國會盟等事分既多權難歸一，因於督撫中公舉一人掌之，亦四年一任。任滿，眾皆曰賢，再任四年。退位後，依然齊民齒也（此制創自開國祖華盛頓）。……」參見李圭：《環游地球新錄》，頁 260。

³⁶ 原文是：「……伯理璽天德宮，營構皆白石，故民間稱為『渭德好施』，譯

約略在1870年代的時分，「伯理璽天德」與「統領」兩個辭彙，好似處於「競爭」的地位，有時則可以劃上等號。例如，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主導下的《教會新報》³⁷（1868年創刊時名曰《中國教會新報》，1872年8月始易此名），³⁸在1871年左右，即將法國的「統領」或「總統」與美國的「伯理璽天德」等同：

法國欲自立為民主之國，七十餘年業已數次矣。廢王拿破崙第一之先，即以國亂無君，國中臣民公舉之為統領者也。……及今法王之蒙塵也，國人遂因亂廢王，自稱民主，今已舉參亞為總統，即花旗之所謂大伯理璽天德也。³⁹

類似的觀點，亦可見諸張自牧（1833-1886）完成於1870年代末期的《蠡測卮言》的述說，⁴⁰張自牧指出「民主之國」的特色是：

民主者，設首領以治國事。……今稱伯理璽天德，美利堅、法蘭西之俗也。⁴¹

他將並列為「民主之國」的美、法兩國之元首，皆視為可以等同的

即白屋。……」參見李圭：《環游地球新錄》，頁257。

³⁷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教會新報》（臺北：京華書局，1968年〔景印〕）。

³⁸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修訂版〕），頁309。

³⁹ 〈法國參亞攝位〉，《教會新報》，期數不詳，景本第3冊，總頁1405-1406；按：「參亞」指 Adolphe their（1797-1877），他在1873年5月24日宣布辭去總統職，故此當為1873年以前的報導；而在此則報導之前，《教會新報》刊有王韜的〈法臣花父議和始末〉景本第3冊，總頁1319-1322；刊出時間為1871年5月，據 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Athens, G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123. 故本則報導的刊出時間也可能是1871年。

⁴⁰ 潘光哲：〈張自牧論著考釋笥記：附論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思考〉，《新史學》第11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105-121。

⁴¹ 張自牧：《蠡測卮言》，頁3B，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帙；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景印〕）。

「伯理璽天德」。由林樂知為主要譯者的《列國歲計政要》(1875年),⁴²對「阿根廷」這等「民主國」的元首,也稱為「伯理璽天德」。⁴³曾經追隨郭嵩燾(1818-1891)出使英國,日後擔任過駐日公使的黎庶昌(1837-1897),集其異國之見聞,撰為《西洋雜誌》,⁴⁴記述他在法國參加總統宴會時,對法國與美國的總統都以「伯理璽天德」稱之;⁴⁵當他在光緒五年正月十四日(1879年2月4日),與郭嵩燾同訪瑞士時,⁴⁶則說「西洋民政之國」的國家元首為「伯理璽天德」,但僅「尚擁虛名」,而瑞士是連「伯理璽天德」一職都未曾設置的國家,所以「無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視民政之國又益化焉」。⁴⁷可以

⁴²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麥丁富得力編纂，林樂知口譯，鄭昌棧筆述：《列國歲計政要》，12卷，江南製造總局鉛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按：《列國歲計政要》之出版年，說法一，梁啟超繫其「撰譯年」為「光緒四年」（1878），又謂「其書為同治癸酉年之書」。見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卷上，頁10A；梁啟超：《讀西學書法》，頁7B，參見氏著：《西學書目表》，收於盧靖編：《慎始基齋叢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湘學新報》的「書目提要」則謂「是書編於同治十二年」。參見唐才常主編：《湘學新報》，第3冊，頁1597；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湘學新報》（臺北：華文書局，1966年〔景印〕）；同治癸酉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前行研究者如熊月之的述說並不一致，或謂出版於1874年，或謂出版於1878年，參見氏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頁407、頁423；鄭昌棧《列國歲計政要序》（繫年為「光緒紀元秋八月」，即光緒元年〔1875〕），略謂：「此書係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所輯」，是以，筆者認為，《列國歲計政要》應出版於1875年。

⁴³ 原文是：「阿根廷。舊名拉不拉搭。本西班牙屬地，後乃自立為民主國。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五月，頒行國例，立伯理璽天德，柄國政，以六年為期……。」參見《列國歲計政要》，卷9，頁18A。

⁴⁴ 黎庶昌：《西洋雜誌》，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頁363-615；以下引用，逕注書名與頁數；按：《西洋雜誌》出版於1900年。參見黃萬機：《黎庶昌著作簡介》，收於氏著：《黎庶昌評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72-273；《走向世界叢書》即依據1900年版。

⁴⁵ 原文是：「……伯理璽天德宴客於勒立色宮，……余亦與焉。……第一坐，係前任美國伯理璽天德格蘭脫……。」黎庶昌：《西洋雜誌》，頁409。

⁴⁶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卷3，頁756-757。

⁴⁷ 原文是：「西洋民政之國，其置伯理璽天德本屬畫諾，然尚擁虛名。瑞士

想見，1870 年代之際，「伯理璽天德」一詞的含意，已然擴大，非專指美國的元首了，而可以是對於那些「民主之國」／「民主國」之元首的稱謂。

三、

「總統」等同於「伯理璽天德」的觀念，還透過報刊而傳播廣泛。例如，由基督教士創辦，在晚清思想界影響深遠的《萬國公報》，⁴⁸ 早在 1874 年即將「美國民主曰伯理璽天德」⁴⁹ 的訊息提供給讀者；此後《萬國公報》對美國總統的稱謂，即便未嘗確定不易，「伯理璽天德」一詞仍為傳唱的主調。⁵⁰ 例如，同在 1878 年出版的《萬國公報》，或是在簡略的新聞報導裡指稱「美國為民政之國」，她的元首名稱是「伯理璽天德」，即是「首領」的音譯之詞，也可稱為「總統」；⁵¹ 或是在長篇大論之作裡，供應稍有不同的資訊，如其刊出一

並此不置，無君臣上下之分，一切平等，視民政之國又益化焉。……」黎庶昌：《西洋雜誌》，頁 513。

- ⁴⁸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萬國公報》（臺北：華文書局，1968 年〔景印〕）；相關研究甚眾，不詳舉。
- ⁴⁹ 原文是：「美國民主曰伯理璽天德，自華盛頓為始，已百年矣。例以四年換舉，或有在位深得民望者，再行接立四年。……」參見〈大美國事：選舉民主〉，收於《萬國公報》，第 7 年第 316 卷〔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874 年 12 月 19 日）〕，景本第 1 冊，總頁 440。
- ⁵⁰ 當然，《萬國公報》亦有尊美國總統為「國皇」者，然其同一篇報導之述說，則亦可能即以「伯理璽天德」稱之，如其報導標題為「大美國事：公舉國皇已定」，內容則為：「美國公舉伯理璽天德，現已舉定，通國無有異言。……」參見〈大美國事：公舉國皇已定〉，收於《萬國公報》，第 9 年第 429 卷〔光緒三年正月廿六日（1877 年 3 月 10 日）〕，景本第 6 冊，總頁 3504；舉此一例，以見一斑。
- ⁵¹ 原文是：「美國為民政之國，其主曰伯理璽天德，即譯言首領也，而亦稱總統。美國前首領格蘭忒自致政後，……本年有游覽之興……。」〈大美：首領游歷紀程〉，收於《萬國公報》，第 10 年第 508 卷〔光緒四年九月十日（1878 年 10 月 5 日）〕，景本第 9 冊，總頁 5513。

篇具有世界各國政體類型知識之分類「概念工程」意義的文章，⁵² 述說美國總統的辭彙卻是「統領」。⁵³ 翌年，《萬國公報》報導歡迎美國總統「古難得」⁵⁴ 來訪的新聞，即有說明曰：

此節係照新報原稿列報。但中有總統二字，悉改伯理璽天德六字，用特註明，以免觀報者之誤。⁵⁵

蓋當時實可視為「新聞的百貨公司」(department of news) 的《申報》報導此事，⁵⁶ 「伯理璽天德」和「總統」即是交相並用：

⁵² 關於中國晚清時期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述說，參見潘光哲：〈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化——以蔣敦復與王韜為中心〉，《新史學》第22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13-159；潘光哲：〈美國傳教士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的發展（1861-1896）〉，《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79-229。

⁵³ 原文是：「……美國之主，稱曰統領。前羈大英，今百年之前自立為國，故舉統領督管政事。……」參見〈公報弁言〉，收於《萬國公報》，第10年第503卷〔光緒四年八月初四日（1878年8月31日）〕，景本第9冊，總頁5361；此文係慕維廉執筆：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4.

⁵⁴ 即格蘭特（Ulysses S. Grant），1869年至1877年擔任美國總統。

⁵⁵ 〈各國近事：大清：預備禮接美國前伯理璽天德〉，收於《萬國公報》，第11年第537卷〔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三日（1879年5月3日）〕，景本第10冊，總頁6271；當時《萬國公報》報導此事，或有特別尊稱美國總統為「美皇」者，惟文章即嘗特別聲明曰：「伯理璽天德者，譯之為民主，稱之為國皇者，華人尊而重之也。……泰西除德、俄、奧等國之主，自尊為皇帝外，英、美、法諸大國皆不然，恐民心大有不服也，故英稱為君主，美、法稱為伯理璽天德。……」參見〈政事：紀兩次在位美皇來滬盛典〉，收於《萬國公報》，第11年第541卷〔光緒五年四月十一日（1879年5月31日）〕，景本第10冊，總頁6351-6352。

⁵⁶ 參見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2.

表一：《申報》「伯理璽天德」和「總統」用例表

標 題	報導內容	《申報》出處
〈總統來華〉	美國之前總統干特於辭位後，意欲游歷天下……	1879年2月24日
〈前總統將來上海〉	美國前伯理璽天德干特游歷歐洲後，將至香港，而來上海……	1879年2月27日
〈紀總統到滬情形〉	美國前伯理璽天德大將軍將來滬上……	1879年5月18日
〈譯西報記李中堂禮賓事〉	《字林報》云：美國前總統格蘭脫自京回津……	1879年7月4日
〈論美總統允代懇撥還兵費盈餘〉	前日本報譯述美前總統在天津接見籌賑華董情形……	1879年7月6日

可以推想，「伯理璽天德」和「總統」等同，應於1870年代末期已經形成了風氣。

當然，正如同張德彝選用辭彙述說美國元首之辭彙，未必一定要將「統領」與「伯理璽天德」劃上等號一般，《申報》對於美國元首之稱謂，也不是始終統一不易。早在《申報》創刊初始，述說美國總統接見日本使節一事即謂：

日本出使諸國使臣先抵美國華盛頓京城，於西三月四號，入見美國總統忌蘭。⁵⁷

此後《申報》的版面上，「總統」一詞屢見不鮮，如報導格蘭特當選連任美國總統的新聞，即頗多以「美國總統」為標題者；⁵⁸「伯理璽

⁵⁷ 〈日本使臣至花旗見國君〉，收於《申報》，1872年5月7日，第3-4版；所謂「美國總統忌蘭」，即格蘭特。

⁵⁸ 如：〈美國總統留任〉，收於《申報》，1872年8月6日，第3版；〈美國總統接任〉，收於《申報》，1872年11月16日，第3版；〈美國公舉總統人數〉，收於《申報》，1872年12月3日，第3版；餘例不詳舉。

天德」稍後也開始出現在《申報》的版面上。⁵⁹ 爾後《申報》更還出現解釋凡如「美」、「法」、「瑞士」、「墨西哥」、「毗魯」等等「民主國」之元首皆為「總統」，其英文音譯是「潑拉集騰忒」，即是「伯理璽天德」的文章。⁶⁰ 正與1870年代之際將「民主之國」／「民主國」之元首稱謂為「伯理璽天德」的言論風潮相呼應。

再以在晚清思想界地位獨特的王韜（1828-1897）為例，他在1870至1880年代間的幾部重要著述：《重訂法國志略》、《普法戰紀》與《弢園文錄外編》裡，也已然明確表達諸若「伯理璽天德」、「總統」和「統領」等等辭彙可以相互等同，交相並用的言論風潮：

⁵⁹ 目前知曉，「伯理璽天德」首見於《申報》，係1876年11月8日的報導：「……初六日午刻，劉、鄭兩君就飯館請宴，同席連幼童約百四十人。……申刻，見美國大伯理璽天德於總管公署。伯理璽天德因事駕臨費城，知幼童至，甚喜，特令總管轉言……。」參見：〈記哈佛幼童觀會事〉，收於《申報》，1876年11月8日，第3版；餘例不詳舉。

⁶⁰ 〈西陲續信〉，收於《申報》，1878年8月30日，第2版；按：這是《申報》接獲署名「海上壽萱生」之來函，解釋各國元首之英文稱謂的內容，原文略曰：「……接海上壽萱生來函，譯論明通，殊深欽佩，今云：……此等名目，新聞紙內常用之，習西學者，每以一時無從索解為憾。蓋英文原有一定。其稱治數國之皇帝，曰愛姆潑漏，今用之於中華、俄、普、奧、巴西等國，日本有時亦用之。……治民主國之總統，曰潑拉集騰忒，即伯理璽天德，今用之於美、法、瑞士、墨西哥、毗魯等國。」

表二：王韜「伯理璽天德」、「總統」、「統領」用例表

著作	《重訂法國志略》 ⁶¹	《普法戰紀》 ⁶²	《弢園文錄外編》 ⁶³
述 說	泰西國例，有自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民主者，稱伯理璽天德，譯言大統領；……稱統領者，如美利堅之聯邦是也，而歐洲之瑞士國亦屬近是。……	泰西諸邦立國有三等，曰君為主……曰民為主，如今之法蘭西及瑞士、美利堅等國是也；曰君民共為主……民為主者，稱總統，西語曰伯理璽天德。……	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曰君主之國，一曰民主之國……如法、如瑞、如美等，則為民主之國，其稱尊號曰伯理璽天德，即中國之所謂統領也。……

晚清中國第一部關於美國開國元首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的傳記專書，是黎汝謙與蔡國昭依據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 *The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喬治·華盛頓傳》），聯合完成的心血：《華盛頓全傳》（1886年刊行），明確指稱，「伯理璽天德」就是「總統」；對比原著，「伯理璽天德」確實是“president”的對等辭彙：

⁶¹ 王韜：《重訂法國志略》，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仲春淞隱廬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16，頁1A-3A。

⁶² 王韜：〈凡例〉，頁1A，收於《普法戰紀》，弢園王氏刊，遯叟手校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⁶³ 王韜：〈重民下〉，收於《弢園文錄外編》，丁酉〔光緒廿三（1897）年〕仲夏弢園老民刊於滬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1，頁19A-19B；參見王韜著，朱維錚、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25。

表三：《華盛頓全傳》原著、譯文“president”和「伯理璽天德」、「總統」對譯表

原 著 ⁶⁴	譯 文 ⁶⁵
<p>The inauguration was delayed for several days by a question which had risen as to the form or title by which the president elect was to be addressed……when it was finally resolved that the address should be simply “<i>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i>” without any addition of title; a judicious form which has remained to the present day.</p>	<p>時議會稱號儀式未定，未即行即位之禮，越數日乃議定，稱合眾邦伯理璽天德（譯言總統也），遂沿習至今不改。</p>

可以想見，「伯理璽天德」和「總統」等同，都是與“president”的對等辭彙，已在1880年代的漢語世界，獲致基本共識。

四、

只是，「伯理璽天德」作為“president”的對等辭彙，也很難說處於完全穩定不易的狀態。在晚清思想界廣受推崇，影響深遠的名著，⁶⁶

⁶⁴ Washington Irving,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New York: G. P. Putnam, 1857), 4: 511-512.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著重號為引者添加。

⁶⁵ 黎汝謙、蔡國昭同譯：《華盛頓全傳》，[光緒十二年(1886)]孟冬月刊印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頁8B；著重號為引者添加。

⁶⁶ 蘇聯史家 S. L. Tikvinsky 指出，《佐治芻言》影響了康有為的《大同書》，參見 Adrian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43.

由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譯的《佐治芻言》（1885年出版），⁶⁷即說當美國獨立之後：

所舉總統，名溥來西鈍得者，職分亦與前英國所派之官相等。⁶⁸

也就是說，在1880年代時，即便「伯理璽天德」、「總統」和「統領」等辭彙可以等同交互使用，傅蘭雅的《佐治芻言》卻可以別出新杼，自創「溥來西鈍得」這樣前所未有的辭彙。

即令傅蘭雅自出別裁，創造「溥來西鈍得」這樣的辭彙，卻在當時的「言論市場」上，似乎不受「青睞」，大多數的論者都還是展現美國等「民主之國」／「民主國」之元首稱謂或為「伯理璽天德」或為「總統」，並且兩者等同的認知。如生平事蹟尚不得其詳的沈純（生卒年不詳），有《西事蠡測》之作，⁶⁹即表示「民政之國，其總統曰伯

⁶⁷ 《佐治芻言》，江南製造總局鉛版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孫青指出，這部《佐治芻言》底本為英國錢伯斯兄弟（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編輯的教育叢書之一種，原著為 *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作者為愛丁堡法學家 John Hill Burdon，1852年出版，主譯者傅蘭雅，應祖錫為助譯者，參見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頁164-165、頁169；Adrian A. Bennett 注明是著原來出版資料為：“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 in *Chamber’s Education Course*, ed., Wm. and Robt. Chambers (Edinburgh: Chambers, 1836-1894) “Complete List of John Fryer’s Translations,” *idem.*,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100；參見姚崧齡：〈傅蘭雅譯著中西名稱對照表〉，收於氏著：《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頁137。綜上一切，可以推斷，本書當係1885年版。

⁶⁸ 傅蘭雅：《佐治芻言》，頁41A。

⁶⁹ 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沈純：《西事蠡測》，收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帙；文中言及：「光緒八年（1882），禁煙會中請禁煙之稟，多至七百餘章……」（頁1A），亦稱：中國電報「近來天津新設一線，由陸路達於上海」（頁7B）。按：津滬陸路電報線於1881年11月完工，12月間投入使用，參見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466-1467。因此，《西事蠡測》必撰成於1882年以

理璽天德，由民間公舉，定以年限，君非世及，怠荒之政無聞，政以眾成，上下之情得達」。⁷⁰又如 1883 年時嘗出洋遠游體會異國風土的袁祖志（1827-1898），⁷¹也清楚知曉法國本為「君主之國，自經德國挫敗之後，改為民主之國」的變化，謂其國元首「四年一更，由民間公推，稱為伯理璽天德」。⁷²

下逮 1890 年代初期，大清帝國出使大英帝國等國欽差大臣薛福成（1838-1894），從對世界各國政體類型進行分類「概念工程」的述說脈絡裡指陳，所謂「而立潑勃立克」“a republic”的體制，其意即為「民主國」，「主政者伯理璽天德，俗稱總統」。⁷³在他的筆下，不僅美、法都是「民主國」，元首可稱為「伯理璽天德」或「總統」，許多中南美洲的國家元首，亦可如是稱之：⁷⁴

後，應可視為 1880 年代中期以前之作品。

⁷⁰ 沈純：《西事蠡測》，頁 2B。

⁷¹ 袁祖志於 1883 年隨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遊歷法、德等國，凡十個月，歸國後於 1884 年出版《談瀛錄》，參見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收於氏著：《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〇八》（臺北：麥田出版，2009 年），頁 177、189-194。

⁷² 袁祖志：《談瀛錄》，〔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卷 1，《瀛海探問紀實》，頁 8A。

⁷³ 原文是：「泰西立國有三類：……曰而立潑勃立克，譯言民主國，主政者伯理璽天德，俗稱總統，民間公舉，或七歲，或四歲而一易。」薛福成：〈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六日（1890 年 4 月 5 日）日記〉，收於《出使日記》，卷 1，頁 47A。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薛福成：《庸盦全集》，〔清光緒廿四年（1898）〕刊本（臺北：華文書局，1971 年〔景印〕），總頁 860。

⁷⁴ 本表僅為舉例展示；當然，薛福成的述說，其實亦有所本，不詳析論。

表四：薛福成「伯理璽天德」、「總統」用例表

墨西哥	「墨西哥，為北美洲最南之國，係聯邦民主……道光元年始逐西人為民主國……國政大致同米利堅，伯理璽天德一人，四年一舉……」 ⁷⁵
可倫比亞	「可倫比亞民主國，在南美洲西北隅……波里瓦為總統，而可倫比亞始定為民主國……咸豐十一年，內訌又作，可倫比亞遂成聯邦民主，十三年，國政一仿美國，總統二年一舉。……光緒……十二年，悉改舊制，設總政府，改九邦為九部，……總政府以伯理璽天德統之，六年一選……」 ⁷⁶
委內瑞辣	「委內瑞辣，南墨洲最北之民主國也……有上、下議院、伯理璽天德正、副二人……其制悉仿美國云……」 ⁷⁷

從薛福成的述說為例，略可想見，前此對於凡為「民主之國」的元首，皆可用「伯理璽天德」和「總統」稱之，二者實為等同並存的言論潮流，愈形擴展，曾無已時。

可以說，正是在這等知識積累的基礎上，在1890年代以後，對於「民主之國」的元首，人們已然眾知共曉，可稱之曰「伯理璽天德」或「總統」。這等「共識」既成，甚於在述說評騭現實事務之際，往往可以方便地信手捻來，毋庸多加論證，彼此共曉其意。1895年在臺北成立的臺灣民主國，震驚一時，其經過與意義之所在，便是一例。

五、

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無疑是為因應日本即將成為臺灣的主人而出

⁷⁵ 薛福成：〈光緒十八年二月廿八日（1892年3月26日）、廿九日（27日）日記〉，收於《出使日記續刻》，卷3，頁81B-82B（《庸齋全集》，總頁1125）。

⁷⁶ 薛福成：〈光緒十八年十月九日（1892年11月27日）日記〉，收於《出使日記續刻》，卷6，頁6B-7B（《庸齋全集》，總頁1215-1216）。

⁷⁷ 薛福成：〈光緒十九年五月廿八日（1893年7月11日）日記〉，收於《出使日記續刻》，卷7，頁84B-85B（《庸齋全集》，總頁1298-1299）。

現的，可謂是華人取用西方的政治概念，建立政府，進而抵抗外來侵略的行動，在歷史舞臺上的首度問世，⁷⁸ 以「民主」為國名，前所未有。

只是，即如前行者若薛福成將「而立潑勃立克」等同於「民主國」一般，臺灣民主國以「民主」為國名，對應的英語也是“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如方其問世之際，在臺北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她的英語名稱是“The Republic of Formosa”，稍後在臺南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則是“Taiwan Republic”或“Formosa Republic”。⁷⁹ 在1895年5月23日發布的〈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Offici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⁸⁰ 即稱說要「自立為民主之國」，公推臺灣巡撫唐景崧（1841-1903）為「民主國總統」。⁸¹ 唐景崧面對大日本帝國兵臨臺灣納為領土前夕，即向與他關係密切的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商議因應之道；⁸² 待斯事「木已成舟」，

⁷⁸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收於氏著：《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年），頁1-2；Harry Jerome Lamley, “The 1895 Taiwan Republic: A Significant Episod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7, no. 4 (August 1968): 740.

⁷⁹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頁39。

⁸⁰ 〈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漢語原文不可得見，外語譯文則至少有英、德文兩種，英譯見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1903), 279-280. 漢譯參見蔡啓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據英譯本譯為漢語；此處引用，基本依據吳譯，並與收於 Davidson 一書之英譯與蔡啓恒之漢譯，相互覈校。

⁸¹ 原文是：「……臺民，誓不服倭……爰經會議決定，臺灣全島自立，改建民主之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從公處置（And we have in Council determined to convert the whole island of Formosa into a Republican State,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ll our State affairs shall be organized and carried on by the deliberations and decision of Officers publicly by us the People）……巡撫兼署臺灣防務唐景崧夙為人民所敬仰，故由會議公推為民主國總統（the position of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蔡啓恒漢譯本作：「臺灣同胞，誓不服倭，……爰經大會議決，臺灣自立，改建民主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秉公處理，……巡撫兼總司令唐景崧素為萬民所敬仰，故由大會公推為民主國總統。……」收於《臺灣之過去與現在》，頁198。

⁸² 所以張之洞被形容為臺灣民主國的主要庇護者（patron），參見 James W.

唐景崧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署）與張之洞報告，自己的職位是「臺灣民主國總統」；⁸³ 唐景崧以「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名義發布的「布告」也稱說「改臺灣為民主之國」，自稱為「總統」，使用「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的印信。⁸⁴

臺灣民主國的成立，在當事者看來，是自為「民主之國」，她的元首是「總統」；時人黃遵憲（1848-1905）詩詠其事即謂「直將總統呼巡撫」。⁸⁵ 當時的媒體，對臺灣民主國與這等行動的觀察，亦復如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284；參見蔡啓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頁201。

⁸³ 唐景崧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署）的電報謂：「……臺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於五月初二日齊集衙署，捧送印旗前來，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為『藍地黃虎』強臣暫留，保民理事，臣堅辭不獲，……不得已允暫視事……嗣後臺灣總統均由民舉，遵奉正朔，遙作屏藩。……」參見唐景崧：〈唐撫臺致總署電〔光緒廿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未刻到〕〉，收於《張文襄公全集》，卷146，頁6A-6B（《張之洞全集》第8冊，頁6411）；唐景崧給張之洞的電報謂：「日本索割臺灣一島，臺民忠義，誓不服倭，……因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適崧奉旨內渡，摒當起程，臺民間知，於五月初二日擁集衙署，捧送印旗印文曰：『臺灣民主總統之印』旗為『藍地黃虎』強崧暫留，保民禦敵，堅辭弗獲，不得已允暫主。……」參見唐景崧：〈唐撫臺來電〔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四日（1895年5月28日）丑刻到〕〉，《張文襄公全集》，卷146，頁5B-6A（《張之洞全集》，第8冊，頁6410-6411）按：《張文襄公全集》本作〔光緒廿一年五月初初日丑刻到〕；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王樹相編：《張文襄公全集》，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參見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⁸⁴ 原文是：「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復索臺灣一島。臺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換約。全臺士民，不勝悲憤。……臺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五月初二日，共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即日議定，改臺灣為民主之國……」。〈臺灣自主文牘〉，收於《萬國公報》，第78卷〔光緒廿一年六月（1895年7月）〕，景本第24冊，總頁15366-15367；〈照錄臺灣開基立國示〉，收於《申報》，1895年6月10日，第1-2版；參見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132（惟《申報》與黃秀政之引文，與《萬國公報》刊本，字詞略有歧異，不涉大旨，不詳覈校）。

⁸⁵ 原文是：「……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

此。如《申報》報導此事，或表示臺灣居民「爰循西例將臺灣認爲民主之國」，「公舉」唐景崧爲「伯理璽天德」；⁸⁶ 亦或表示臺灣已「照美利堅等國例，推舉總統，立爲民主之國」；⁸⁷ 同時風行的《點石齋畫報》，屢屢刊出與時事相呼應的作品，足可展現當時一般輿論對世局變易的認知，⁸⁸ 同樣稱說這是「自立爲民主之國」的行動，她的元首是「總統」，亦可尊曰「伯理璽天德」。⁸⁹ 稍後的《知新報》則在論說「亞洲民主之局，尙未有人開之也」的脈絡裡表示：

臺灣既割，本非中國之有矣。臺民奉唐景崧爲伯理璽天德，於中國君臣之義，本無相礙也。而中國庸狎之倫，口誅之，筆伐之，幾至不容大地。⁹⁰

凡是可見，作者亦視此舉爲開創「亞洲民主之局」的行爲，其首領爲「伯理璽天德」，並對與其事者卻成爲「庸狎之倫」批判的對象，遭受「口誅筆伐」的命運，深感哀嘆。⁹¹ 當時身歷其境的臺民如

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參見黃遵憲：〈臺灣行〉，收於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冊，頁689；錢仲聯言，此詩爲黃遵憲戊戌（1898年）之後回鄉補作（頁687）。

⁸⁶ 〈海外扶餘〉，收於《申報》，1895年5月26日，第1版。

⁸⁷ 〈慷慨陳詞〉，收於《申報》，1895年6月5日，第2版。

⁸⁸ 研究《點石齋畫報》的成果甚眾，注意它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有什麼樣的觀察，亦漸受注意，例如石曉軍編著：《『点石斋画報』にみる明治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04年）；餘例不詳舉。

⁸⁹ 原文是：「臺灣自入版圖，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被倭人無端索割，全臺人士義憤填膺，屢次叩閣，求予免割，未蒙允准。於是群情迫切，思自奮發，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臺撫唐薇帥智略過人，民心愛戴，爰循西例，推爲總統，尊之曰伯理璽天德，主持一切軍國政事，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海外扶餘〉收於《點石齋畫報·書集》（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年），第12冊，無頁碼（圖號146）。

⁹⁰ 〈論民主革命皆不宜於中國舍復辟第二義〉，收於《知新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1901年1月20日，第133冊，頁4A，總頁2059。

⁹¹ 參與臺灣民主國的官紳，在事敗回到中國後，則明顯受到排擠，參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

洪繻（1867-1929），事後追述其史，亦稱唐景崧所為乃是「伯理璽天德事，稱臺灣大總統，建號民主國」。⁹²

可以說，臺灣民主國的成立，是以前此提供的知識作為動力泉源，意欲付諸實際而卻「曇花一現」的行動。當事者或是一般輿論的認知所在，則同流共聚，以相同的辭彙表達對於這一事件的理解、掌握和認識，他們分潤同享的「共識」，基本上是一致的。

大致而言，約略在1890年代中期之後，「伯理璽天德」這個辭彙作為「民主之國」的元首名稱，遇上了「總統」這個更為強勁的「競爭對手」，並隨著後者被廣泛地流行利用，「伯理璽天德」遂乃逐漸從現實的漢語世界「淡出」，僅止留存歷史的軌跡。

六、

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兩廣總督譚鍾麟（1822-1905）從康有為（1858-1927）家裡抄獲了梁啟超（1873-1929）寫給康有為的一通書信。梁啟超在這通信函裡，對譚嗣同（復生，1865-1898）讚譽有加：

譚服生（復生引者按）才識明達，破例絕倫，所見未有其比，惜倭西學太甚，伯里璽之選也。

不過，始終攻擊康有為與梁啟超師徒不遺餘力的葉德輝（1864-1927），⁹³

222-225。

⁹² 原文是：「……唐撫軍有伯理璽天德事，稱臺灣大總統，建號民主國，立藍地黃虎旗，有誓死不去意。百姓大懼，……全臺各局，復爭擁總統固守地方。……」參見洪繻：《寄鶴齋瀛海偕亡記》，收於《洪棄生先生遺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冊，頁4606；參考洪繻：《瀛海偕亡記》，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按：是著〈原序〉繫年，自署為〔光緒卅二年（1906）〕。

⁹³ 參見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再思

則視這通信爲康、梁師徒之「逆跡」的「證據」之一，編入《覺迷要錄》一書，⁹⁴以爲批判之資。顯然，在葉德輝的心目裡，康、梁師徒居然有意要推舉「伯里璽」，實爲彼等「逆跡」之一；那麼，言下之意，被梁啟超認爲具有「伯里璽之選」資格的譚嗣同，最後遭受棄市就戮的命運，⁹⁵理有應然。可以說，在肯定「君父之倫」絕對優先性的皇權體制之下，像美國這等以選舉方式產生國家元首的政治體制，被認爲毫無可取；「伯理璽天德」作爲民主國家元首之稱謂，在反對倡行「民主」的士人心目裡，自非蘊含正面的意義。⁹⁶前引《知新報》述說臺灣民主國推舉總統的行動，遭受「庸狎之倫」的批判，亦爲一例。

勢隨境轉。當進入廿世紀之後，革命風潮頓起，民主共和體制則是中國的革命黨人懸擬的理想之一。⁹⁷如鄒容（1885-1905）在1903年發表的《革命軍》，影響深遠，在他構思建設「中華共和國」的宏偉藍圖裡，不少主張是對於新近刊布在《國民報》的《美國獨立檄文》的「複製」以及「擴張」，⁹⁸然如其聲言「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

——側重王先謙與葉德輝），收於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15-160。

⁹⁴ 葉德輝輯：《覺迷要錄》，卷4，頁18B；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葉德輝輯：《覺迷要錄》，光緒辛丑〔廿七年（1901）〕冬孟編撰，乙巳〔卅一（1905）年〕夏五刊行本（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年〔景印〕），頁282；按：黃彰健考定是函繫年爲光緒丁酉（1897年）七月下旬或八月初，參見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頁10-11。

⁹⁵ 譚嗣同等六人以「大逆不道」之罪名而被處斬，見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頁1086。

⁹⁶ 這等展現於晚清思想界的言論趨向，或可以「反民主論說」名之，參見王爾敏：《晚清士大夫對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收於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57-270。

⁹⁷ 當然，這並不是說革命黨人完全一致以民主共和體制爲其理想，如將之視爲鐵板一塊，絕無差異，實不免把歷史簡單化，參見潘光哲：《研究近、現代中國民主共和思想的回顧與省思》，收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年），第2冊，頁1632。

⁹⁸ 潘光哲：《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7期（2007年9月），頁22-23。

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為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為副總統」，⁹⁹確可展現其立場意趣。與鄒容以「《蘇報》案」而同受牢獄之災的章太炎（1868-1936），早與孫中山見過面談過話，¹⁰⁰入獄之後也曾於巡捕房致函孫中山「尊稱之為總統」。¹⁰¹胡覺對孫中山膺選「臨時大總統」榮銜的讚譽，孫中山履踐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典禮儀式，則如理所當然地為眾所仰視。顯然，葉德輝等對「民主體制」、「伯理璽天德」及「總統」等辭彙的非議批判，好似過眼煙塵。「總統」作為民主共和體制之國家元首的稱謂，則是眾所公認，在此後中華民國／中國的政治生活裡，也就此落實成真。辭彙的定著，引發了價值觀念等諸般層域的轉換。由「伯理璽天德」到「總統」的曲折，當可展現近代中國觀念變遷的歷史圖景之一頁。

當然，由「伯理璽天德」演變為「總統」的歷史，多樣難盡；本文所為，僅可粗略考證「伯理璽天德」的歷史過程，未必能對「伯理璽天德」得與“president”劃上等號的場景，進行「羅掘俱窮，竭澤而漁」的史料搜索，遺漏必眾。惟則，初以粗線條的勾勒，已可想見，以「伯理璽天德」為“president”的對等辭彙，指稱民主共和體制的國家元首，它在十九世紀的漢語世界裡，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名詞」。只是，「伯理璽天德」固然起源甚早，卻不意味著它從此就可以安寨紮營，平穩定著，往往會遇到各種「競爭者」，舉凡「伯勒格西敦」、「伯勒格斯」、「伯理喜頓」或是「溥來西鈍得」等等，一一登場，共爭相競。因此“president”一詞如何找到恰當的漢語辭

⁹⁹ 鄒容：《革命軍》，收於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頁675-676。

¹⁰⁰ 章太炎與孫中山的關係錯綜複雜，不詳述，參見湯志鈞：〈章太炎和孫中山〉，收於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孫中山研究論文集（1949-198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下冊，頁1278-1294；餘例不詳舉。

¹⁰¹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88。

彙，作出適當的表述，並不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實非一語足可概括。「伯理璽天德」在漢語世界裡可以和“president”劃上等號的歷史，錯綜複雜；同受西力衝擊的日本，亦復如是。日本在「文明開化」的過程裡，也歷經相類的過程，為理解來自西方各色事務／事物而出現的「新造語」（或曰「鑄造語」〔coined word〕），同樣層出不窮；「同指異名」的現象，率皆比比皆是。先驅研究者齋藤毅（1913-1977）早即指陳，這些「新造語」的問世，固然與「文明開化」的走向，密不可分；但是，必須要能掌握具體的歷史脈絡，進行文獻的實證考察，始可知曉前行者創造這些辭彙的苦心孤詣，充分展現「新造語」的創生、推移和定著的複雜過程，如何為觀念／學術／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和理解，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¹⁰² 日本對於“president”的翻譯，也同樣走過繁複難盡的歷程，而以1858年之「日米修好通商條約」使用「大統領」一詞，漸成定議，沿用至今，具體顯示它做為「新漢語」之一例。¹⁰³

近代言論界的鉅子梁啟超曾經在批判漢字如何妨礙了中國的進步的文脈裡指陳，人類社會持續變遷發展，新生事物和新興現象必然層出不窮，過去的辭彙文字想要描述「萬流匯涑、群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實在無能為力，「新名詞」自然源源不絕，「一新名物新意境

¹⁰² 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東京：講談社，2005年）。

¹⁰³ 孫建軍：〈新漢語「大統領」の成立について〉，《第4回漢字文化圏近代語研究会》（大阪：關西大學，2004年3月13-14日），頁217-230，網址：<http://www2.ipcku.kansai-u.ac.jp/~shkky/data/2004symp.pdf>，檢索日期：2010年7月19日。其實，在近代日本的脈絡裡，關於漢字的作用，始終論爭不斷，甚有「漢字廢止論」主張廢除漢字之議，如對確立日本近代的郵政體制（「郵便制度」）居功厥偉，也被授勳為男爵因之位列「華族」的前島密，嘗有〈漢字御廢止之議〉，以廢止漢字做為建設近代國家的前提，認為「支那」即使是廣土眾民之國，然其人民仍處於「野蠻未開之俗」受西洋諸國的「侮蔑」，活潑而知性能力強的日本人民，怎麼可以一直受「支那字」的「頑毒」感染，受其「精神」束縛呢。參見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頁29；可是，漢字在日本的生命力，不因「漢字廢止論」甚囂塵上而完全消滅。相關課題涉及廣泛，本文不詳論。

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¹⁰⁴「新名詞」當然如湧泉而來。類似的場景與思考，在後進諸國亦屢屢有之，如著名的埃及知識人薩拉馬·穆薩（Salama Musa，1887-1958）即嘗批判曰，埃及使用的阿拉伯語，能夠用以指稱現代事務與概念的辭彙，相當貧乏，正意味著埃及人依然生活在以農務為習的前工業時代，所以也就造成了他們在心智精神（mentality）上依復展現「古代，落伍，遲鈍與只知向後看」的結果。¹⁰⁵就漢語世界言之，既然需要表述「新名物」與「新意境」鑄造諸如「伯理璽天德」這樣的「新名詞」，自是必要之務。檢視「伯理璽天德」這等出現在漢語世界裡的「新名詞」的歷史，當可展現，它在過往的歷史場景裡，曾經取得眾所公認的「共識」意涵，成為「常識」，並且儼如「關鍵詞」一般，可以讓人們信手捻來，用以討論解釋週遭發生的現實事務，對其意義的理解和掌握，彼此共知同曉。引申言之，這等由「新名詞」到「關鍵詞」的歷程／現象，實為近代漢語歷史變遷過程裡值得重視的面向。不過，歷經時代考驗，某些具有「關鍵詞」地位的「新名詞」，卻已被淘汰遺忘，「伯理璽天德」正是其中之一；¹⁰⁶某些曾經被視為「離經背道」，得被「伐而撻之」的「新名詞」，居然「生生不息」，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詞」。像是1890年代中末期，倡言變法維新的梁啟超、徐勤等

¹⁰⁴ 文長不詳引錄，梁啟超：〈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新民叢報》第10號（1902年6月），頁4；約略同一時期的其他知識人的思考（與批判）甚眾，不詳舉引。參見沈國威：〈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對「新名詞」之反應〉，《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2號（2007年3月），頁105-124；沈國威：〈新名詞與辛亥革命時期之中國——以來自日本的影響為中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8冊（2012年2月），頁195-206。

¹⁰⁵ 引自 Yasir Suleiman, *The Arab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Study in Ide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4.

¹⁰⁶ 嚴復苦心孤詣創發各式各樣的翻譯辭彙，不少亦復如是，參見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製漢語的競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王中江：〈中日文化關係的一個側面：從嚴譯術語到日譯術語的轉換及其緣由〉，《近代史研究》第4期（1995年7月），頁141-154。

士人，陸續主持《時務報》、《知新報》筆政，為文立論使用的辭彙，如「壓力」、「阻力」等等，也曾被葉德輝批判為「異學之詖詞」，「西文之俚語」。¹⁰⁷ 只是，在當下的漢語世界裡，這些辭彙非僅絕對不會遭受當年被批判的命運，還是眾所共知襲用不止的日常語言呢。

重溫「伯理璽天德」在漢語世界的歷史，具體顯示，開展近代漢語的歷史變遷的考察，進行近代中國觀念變遷歷史圖景的描摹，由「新名詞」到「關鍵詞」的歷程／現象，自是不可忽視，不可或缺的學術事業。清理相關的具體歷史脈絡和過程，亦可提醒我們，此時此際具有「關鍵詞」意義／地位的那些辭彙，所以會成為「關鍵詞」，本是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一旦將它們「歷史化」，識其淵源，曉其本末，當可顯示這些「關鍵詞」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的意義和地位，其實未必「理所當然」，絕對不是「天經地義」。

（責任編輯：許逢仁）

¹⁰⁷ 葉德輝：〈葉史部長興學記駁義〉，蘇輿輯：《翼教叢編》，〔光緒廿四年（1898）〕序（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年〔景印〕），卷4，頁41A（總頁255）。

徵引書目

- 〈胡覺致胡適函〉（1911年12月31日），臺北：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HS-JDSHSC-0692-009）。
- 《申報》。
- 《知新報》澳門：澳門基金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聯合出版〕，1996年。
- 《教會新報》臺北：京華書局，1968年（景印）。
- 《湘學新報》臺北：華文書局，1966年（景印）。
- 《萬國公報》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景印）。
- 《點石齋畫報·書集》，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年。
- 丁韞良譯：《萬國公法》，同治三年（1864）歲在甲子孟冬月鐫·京都崇實館存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文慶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清內府抄本，北京：故宮博物院，1930年（景印）。
- 王中江：〈中日文化關係的一個側面：從嚴譯術語到日譯術語的轉換及其緣由〉，《近代史研究》第4期，1995年7月，頁141-154。
- 王家儉：《魏源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
- 王爾敏：〈晚清士大夫對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收於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
- 王樹相編：《張文襄公全集》，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王 韜：《弢園文錄外編》，丁酉（光緒廿三年〔1897〕）仲夏弢園老民刊於滬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

館藏。

- 王 韜：《重訂法國志略》，光緒庚寅（十六年〔1890〕）仲春淞隱廬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王 韜：《普法戰紀》，弢園王氏刊，遯叟手校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王韜著，朱維錚、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田濤主編：《清朝條約全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 石曉軍編著：《『点石齋画報』にみる明治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04年。
-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0年。
- 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一八四九—一九〇八》，臺北：麥田出版，2009年。
- 志 剛：《初使泰西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李 圭：《環遊地球新錄》，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李 詳：〈運同銜升用同知浙江海甯州知州李君事狀〉，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卷45，頁18A-20A，收於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沈 純：《西事蠡測》，收於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景印）。
- 沈國威：〈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對「新名詞」之反應〉，《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2號，2007年3月，頁105-124。
- 沈國威：〈新名詞與辛亥革命時期之中國——以來自日本的影響為中心〉，《東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8冊，2012年2月，頁195-206。
- 周商夫編：《新名詞訓纂》，收於波多野太郎編：《中國語文資料彙

- 刊》，東京：不二出版，1995年（據1918年上海掃葉山房刊石印本影印），第5篇，第3卷。
-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長志珠繪：《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
- 姚崧齡：《影響我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
- 洪 繻：《寄鶴齋瀛海偕亡記》，收於《洪棄生先生遺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洪 繻：《瀛海偕亡記》，收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孫 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
- 徐繼畬：《瀛寰志略》，收於白清才、劉貫文主編：《徐繼畬集》，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5年。
- 桑 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袁祖志：《談瀛錄》，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
- 張自牧：《蠡測卮言》，收於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景印）。
- 張德彝：《航海述奇》，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張德彝：《歐美環游記》，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張德彝：《稿本航海述奇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 梁啟超：〈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新民叢報》，第

- 10號（1902年6月20日）。
-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收於盧靖編：《慎始基齋叢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華大學歷史系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
-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陳存恭：〈徐繼畬事略及其《瀛寰志略》〉，收於任復興主編：《徐繼畬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 陳志奇：《中國近代外交史》，臺北：南天書局，1993年。
- 麥丁富得力編纂，林樂知口譯，鄭昌棫筆述：《列國歲計政要》，江南製造總局鈐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傅蘭雅譯：《佐治芻言》，江南製造總局鈐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湯志鈞：〈章太炎和孫中山〉，收於孫中山研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孫中山研究論文集（1949-198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下冊。
-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頁1-42。
- 黃萬機：《黎庶昌評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
- 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論「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天津社會科學》第4期，2005年7月，頁130。
-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葉德輝輯：《覺迷要錄》，光緒〔辛丑（廿七）1901年〕冬孟編撰，〔乙巳（卅一）1905年〕夏五刊行本，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年（景印）。
- 鄒容：《革命軍》，收於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
-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1815至1900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鈴木智夫：《近代中国と西洋国際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
- 熊月之：〈晚清中國對美國總統制的解讀〉，《史林》第1期，2007年2月，頁1-11。
- 熊月之：〈晚清幾個政治詞匯的翻譯與使用〉，《史林》第1期，1999年2月，頁57-63。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慕維廉：《大英國志》，耶穌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江蘇松江上海墨海書院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本。
- 潘光哲：〈研究近、現代中國民主共和思想的回顧與省思〉，《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年。
- 潘光哲：〈美國《獨立宣言》在晚清中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7期，2007年9月，頁22-23。
- 潘光哲：〈美國傳教士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在晚清中國的發展（1861-1896）〉，《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79-229。
- 潘光哲：〈張自牧論著考釋笥記：附論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思考〉，《新史學》第11卷第4期，2000年12月，頁105-121。
- 潘光哲：〈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概念工程」的創造與轉化以蔣敦復與王韜為中心〉，《新史學》第22卷第3期，2011

年9月，頁113-159。

滕固：《蔣劍人先生年譜》，臺北：廣文書局，出版年缺。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同治七年（1868）上海道署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黎汝謙、蔡國昭同譯：《華盛頓全傳》，光緒〔十二年（1886）〕孟冬月刊印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黎庶昌：《西洋雜誌》，收於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薛福成：《庸盦全集》，清光緒〔廿四年（1898）〕刊本，臺北：華文書局，1971年（景印）。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文明開化と日本語》，東京：講談社，2005年。

魏外揚：《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來華宣教士列傳》，臺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

魏源：《海國圖志》，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仲夏古微堂聚珍板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後湖南新舊之爭再思側重王先謙與葉德輝〉，收於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臺北：作者自印本，1985年。

蘇輿輯：《翼教叢編》，光緒廿四年（1898）序，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0年（景印）。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 University Press, 1967.
- Bennett, Adrian A.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Athens, G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People,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Prospects*.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1903；蔡啓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北：臺灣銀行，1972年。
- Durant, Alan. “Raymond Williams’s Keywords: Investigating Meanings ‘Offered, Felt for, Tested, Confirmed, Asserted, Qualified, Changed’.” *Critical Quarterly*, 48: 4 (Winter 2006): 1-26.
- Irving, Washington. *Life of George Washington*. New York: G. P. Putnam, 1857，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James, Cantlie, C. Sheridan Jones. *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912.
- Lamley, Harry Jerome. “The 1895 Taiwan Republic: A Significant Episod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7, No. 4 (August 1968).
- Mittler, Barbara.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Suleiman, Yasir. *The Arab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Study in Ide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3 [revised edition]；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
-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漢籍全文資料庫計畫建置，網址：<http://dbo.sinica.edu.tw/~tdbproj/handy1/>，檢索日期：2011年12月9日。

-
- 西川秀和，〈「大統領」という訳語の由来〉，「歴代アメリカ合衆国大統領研究」，網址：<http://www.american-presidents.info/daitouryoutoiuna.pdf>，檢索日期：2011年4月19日。
- 孫建軍，〈新漢語「大統領」の成立について〉，《第4回漢字文化圏近代語研究会》（2004年3月13-14日），頁217-230，網址：<http://www2.ipcku.kansai-u.ac.jp/~shkky/data/2004symp.pdf>，檢索日期：2010年7月19日。